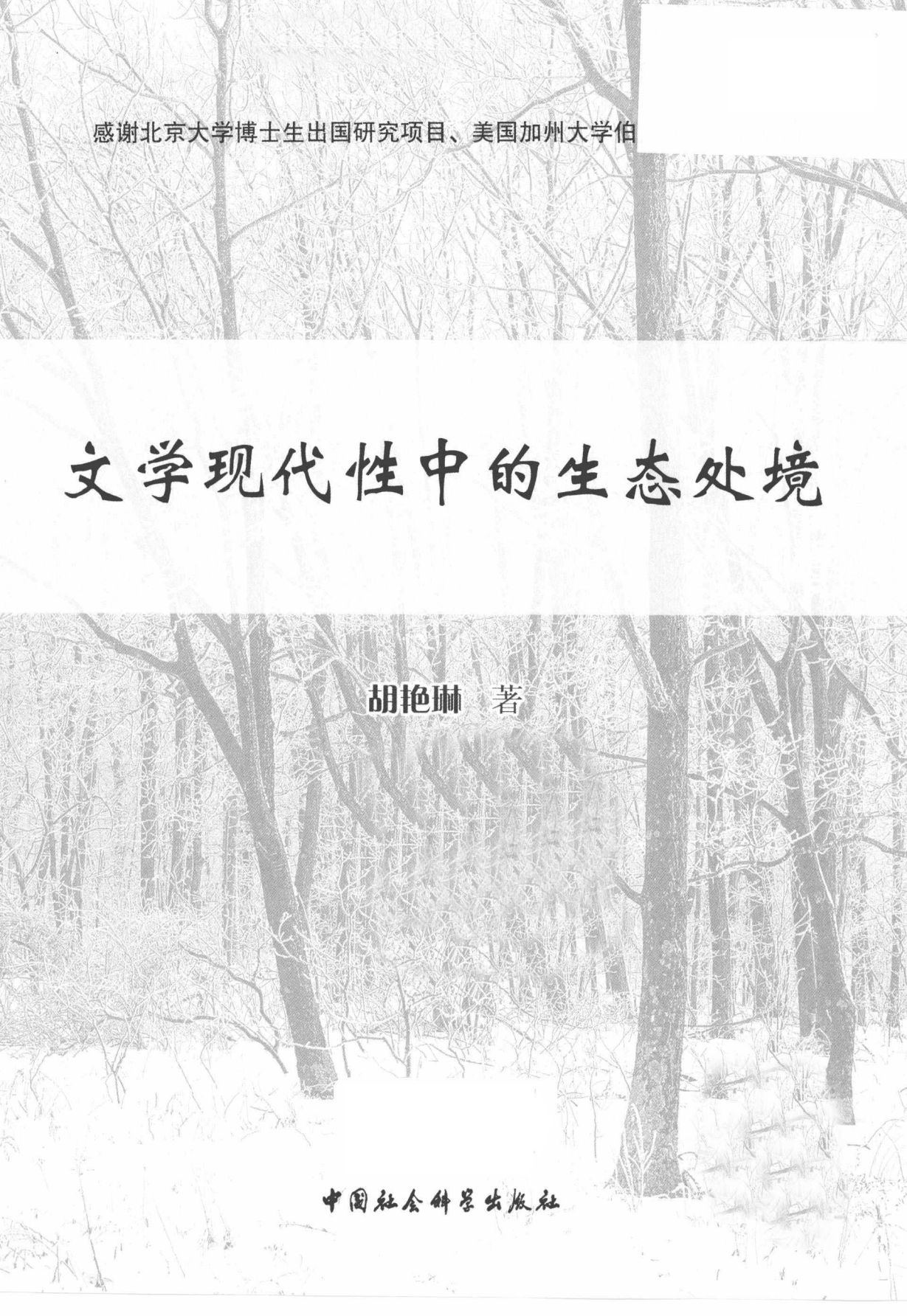




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

胡艳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感谢北京大学博士生出国研究项目、美国加州大学伯

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

胡艳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胡艳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61-3356-9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5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钦仁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王岳川

胡艳琳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是一位非常刻苦勤奋的学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她广泛涉猎了古今中外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论著，发表了多篇有水准的学术论文。经过多年的严格学术训练，其理论功底扎实，知识视野开阔。

追踪学术前沿获得第一手资料，她参加了国内的相关学术会议，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前往生态批评的发源地——美国，她在美国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学习期间，收集和研读了大量英文原著。经过近四年的撰写、修改、完善，她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 3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并即将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生态批评”理论自 20 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发生、发展，并逐渐推向全球，已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生态批评并非简单的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文学研究，而是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已成为反思现代性模式的重要方式。

所谓的现代性，与传统对立，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是西方中世纪神性中心话语遭到启蒙运动挑战后开始出现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只有 500 多年的历史。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紧密相关，短短 200 多年就使西方成为世界霸主。18 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使西方现代性不断加速，19 世纪，藉着海外殖民扩张，现代性的西方开始获得话语霸权，至 20 世纪，凭借在科技、军事、经济等领域的优势，西方成为全球性的话语权力中心。以线性时间观为依据，以流动性和理性主义为特征，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将空间时间化的现代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席卷全球，使东方各国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使整个世界陷

入现代性悖论，对西方而言就是“历史的终结”，对中国而言就是“停滞的帝国”。然而，现代性的极度膨胀导致人类的单面化和异化，会反过来毁灭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核战争、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生态危机……

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潮流，生态批评正是发源于现代性高度发展的美国，它产生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科技理性导致的自然生态危机，二是后殖民主义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三是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三大危机均源于现代性的恶果。面对危机，生态批评提倡由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反思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建设具有生态智慧的新人文精神，为生态危机提供一份文化上的解决方案，从而使人和自然共同走出危机。

然而，“现代性”和“生态批评”都是内涵丰富、聚讼纷纭，很难达成一致认同的概念，作为东西方学术界的核心理念之一，有关现代性的论著汗牛充栋，生态批评则是一个理论庞杂、具有跨学科性的批评体系，可以说，“现代性”和“生态批评”，无论选取哪一个角度，都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和韧性，这也是该论文的难点之一。但作者却对此努力做了较清晰的梳理和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对“生态批评”这一年轻的、还处于进行时的理论，表现出对最新动向及时掌握和准确理解的学术能力。

该书蹊径独辟，以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为整体框架和设论背景，紧扣多套现代性“话语”，以不同现代性话语对待自然的态度——放逐、征用、改造、矮化、压抑——作为揭弊的维度，全书采用生态批评、症候式分析、文本细读、词源学、文化研究等多种理论方法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审美生态，探寻自然审美在20世纪中国多套现代性“话语”中的角色与地位，既有个案分析，也有对思潮、文学现象的整体论述，同时注意到革命文学话语内部对自然审美的多元态度，剖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症候。在呈现自然萎缩、生态恶化、精神降解现象时，从学理层面对现代性倾轧的危机发出警示，直击当代重大问题。

基于生命与学术的有机关联，本书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深度，比如对中国山水画话语在现代性话语中被改造的现象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学术谱系，这是发人所未发的，颇具新意。再如，该书对“自然”在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

的作家作品中被对待、处理的方式进行追溯时，将知识分子身上兼具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观念和对西方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显”与“隐”、“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与纠缠，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文学现代性中生态处境的复杂性，这在国内尚属少见。

该书富有积极的价值建构意识，强调从学术走向实践，有着触碰时代难题的敏锐性和建构自己的叙事框架的理论勇气。通过考察自然审美在现代性诸话语中的缺失及带来的相应后果，作者急切地呼吁，建构一种包蕴生态审美价值观的生态现代性，在亲生命性的基础上，建立生态审美共识，重建文学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接续传统诗学，在与自然韵律的谐振中，栖身游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达到诗意化的生存境界。

胡艳琳博士阅读了大量西方生态理论译著，却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对生态批评的真正精神有深入了解，她还追溯原典，深入到生态批评发源的原初文化生活背景中进行研究。传统与现代密不可分，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她不仅阅读了大量现当代的文本，还花了很大精力和篇幅梳理、研究、论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话语和自然审美传统。

该书将当代问题的思考纳入学术研究之中，有很好的问题意识。今日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过速拓展和信仰缺失的消费主义狂欢中，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古今冲突”中传统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中西冲突”中全盘西化引发的中国文化失语、文化身份迷失问题。大城市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迅速扩张，乡土社会在城市化挤压下逐渐萎缩，由此带来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观念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断裂导致的“文化失根”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拷问着走向现代性的人的心灵。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人都将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的冲击和调整，人们的艺术审美方式和栖居方式亦将发生诸多变化。这些深刻的变化，给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留下诸多新的可能性，给现代人怀乡、思乡、回乡，重新走近大自然，重新认识自我，留下了丰沛的想象空间。其实，在我们开始急于走向西方走向现代性时，西方人已开始认识到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危害，转而进行自我反思，迷途知返——标举“生态文化”，从其他文明中汲取生态智慧，西方生态哲人对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国人却陷入西方现代性的陷阱不能自拔。

该书将学术思考与个体思考融会一体，体现人文学术所倡导的主体性

态度，并将这种个体态度上升为文化态度。她对自然、对生态的关注，一方面来自她热爱自然的天性，一方面来自她对人、对时代、对社会、对现实的殷切关注，她始终将学术与自己的生命追求和时代关联起来，带着问题进入学术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论、文学、文化失语的争论不绝于耳，文化身份成为学界重大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过百年发展后，并未随着经济腾飞而崛起，反而像中了九斤老太的魔咒似的，给人一代不如一代的印象？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不相称的疑惑、基于当下凸显的中国文学与文化身份焦虑、基于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性，她选择了结合文学现代性和生态之维来重新审视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不同于国人自己对待自己传统的方式，在言必称西方的时候，作者能够回溯原典，对中国传统诗学做出具有一定独创性的阅读，又在西方理论和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依托下，全面地思考东方、中国文化问题，其世界性眼光和学术的价值关怀，值得嘉许。

作者的理论抱负很大，要试图解释和回答这百年困惑，需要处理的材料很多，既要对比中西，又要考量古今，既要具体，又要宏观，故进入后不易驾驭。从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这一个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加以透视，力图呈现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全貌并非易事，不少问题并未考虑透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还需进一步努力和深入思考。但她是带着问题而来的，故而整体逻辑和大思路很清晰，材料处理较得体，已属难能可贵。

学术著作出版并非易事，胡艳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改，书稿更简练精到。祝胡艳琳博士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登高行远，更上层楼！

是为序。

2013年7月6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言	王岳川(1)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本书涉及的相关概念	(13)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描述	(19)
 第一章 放逐自然:启蒙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审美	(37)
第一节 挑战一回应模式下启蒙现代性的特殊指涉	(37)
第二节 文学现代转型中绿色传统的搁置	(44)
第三节 边缘话语中的自然审美	(52)
 第二章 征用自然:政治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审美	(70)
第一节 政治话语的优先性	(71)
第二节 自然美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分野	(82)
第三节 “人民文学”定位中的自然 ——以山水画改造为例	(90)
第四节 “红色”文学中符号化的自然	(106)
 第三章 改造自然:农业现代化“劳动风景”中的自然审美	(125)
第一节 “劳动”之现代性意义的生成	(126)
第二节 “风景”与自然观考辨	(135)
第三节 古典诗文中的风景与劳动	(140)

第四节	社会主义劳动“新”风景的生成	
——	阶级文化话语权的象征	(149)
第四章	矮化自然:现代抒情话语中的自然	(166)
第一节	传统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	
——	无我之境的追求	(168)
第二节	现代抒情主人公与自然	
——	人类中心主义“大我”的膨胀	(172)
第三节	诗歌的非诗化与小说的诗意化	(190)
第五章	压抑自然:空间现代性中的自然	(224)
第一节	现代城市文明对前现代乡土文明的胜利	(226)
第二节	如何选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235)
第三节	乡土中国与城市化进程的冲突	(256)
结语	自然的复魅与本土诗性精神的甦生	(278)
重要人名和术语索引		(292)
参考文献		(299)
后记		(315)

图目录

- 图 1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111)
- 图 2 傅抱石:《乾坤赤》 (112)
- 图 3 傅抱石:《芙蓉国里尽朝晖》 (112)
- 图 4 新民歌插图《玉米钻上天》 (161)
- 图 5 新民歌插图《踏上梯田上云霄》 (161)
- 图 6 新民歌插图《堆稻》 (162)
- 图 7 新民歌插图《吓得月儿躲天边》 (162)
- 图 8 河北永年县社员张政治:《捉迷藏》 (163)
- 图 9 邳县运河镇:《收高粱》 (163)
- 图 10 邳县运河镇:《号猪去》 (164)
- 图 11 新民歌插图《我来了》 (187)
- 图 12 新民歌插图《凭咱这双手》 (187)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一 文学何为？——20 世纪中国文学身份的焦虑

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国开始与西方的现代性遭遇。历经“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立宪运动的失败之后，中国的文化优越感不断被降解，文学上亦是。

西方现代性挟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从传统不断走向现代的历史，是一段至今仍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历史。中国自此由一个循环自足的时间与封闭的空间，被裹挟进由西方现代性价值取向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转型同时蕴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向度：一是因被奴役、被压迫而急切地向西方寻求救世之方的“启蒙思潮”，这一思潮下国人的心态被杜维明称为“启蒙心态”（Enlightenment Mentality）^①；二是空前的现代民族主义激情，“巴黎和会”谈判空前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忱，“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②，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在“五四”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生成，民族主义激情又促使人反抗西方思想与西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扭结在一起，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各领域研究无法摆脱的大背景。“世界文学”的口号与追求，

^① 杜维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跋》，见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 页。

^②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67 页。

亦是在此大背景下提出的。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最早由歌德在1827年与爱克曼谈话时提出:“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进一步阐释为“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因而避免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马克思、恩格斯的阐释,“世界文学”具有了高于民族文学的普世价值和意义,能否成为更广阔的全球文化空间里的“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一员,是本土文学获得更广泛深切文化身份认可的重要标志,入选“世界文学”的作品,将成为“伟大的作品”。

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答案是:相对边缘。中国文学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答案是:过去很少,现在也不多,一如“汉学”在西方的尴尬位置。直到近段时间,仍有人在问“为什么伟大的时代没有伟大的作品?”^③,并引发了一系列讨论,不少重量级的当代作家、评论家和媒体都参与其中,这正是当下中国经济GDP位居世界第二已跻身世界经济之林,但国际形象却与之不相称的体现,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学与文化身份焦虑的凸显。

当今世界,是一个冲突危机不断而又相互制衡的世界。在地球村里,任何国家想要自外于全球化既不可能,也无异自寻死路。仅凭武力、科技和经济现代化等硬实力,无助于有效化解冲突和危机,必须借助文化软实力,借助文化认同的力量,方可在全球化时代抢占先机。文学是一个社会、国家整体精神面貌与文化身份的映像,在“文学终结”之类话语不断出现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下,我们今后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来有效提升中国文

① [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③ 韩小蕙:《伟大时代为何难觅伟大作品?》,《光明日报》2010年4月14日。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伟大时代为何难觅伟大作品”的讨论,铁凝、何建明、李冰、蒋子龙、刘醒龙、贾平凹、朱向前、雷达、唐晓渡、孟繁华、朱水涌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都参与到讨论中来,《人民日报》还就此专门发表过评论文章。见《文艺报》2010年4月16日第2版。其他类似的文章还有:孟繁华《为中国当代文学辩护》、郑国友《三问中国作家》、朱水涌《当代文学的空间焦虑》,分别见《文艺报》2010年3月31日第2版、2010年4月14日第3版、2010年4月21日第2版。而艺术方面,类似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如《十问当代艺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羲之书画报》(诗书画家月刊),2011年8月15日第1版。

学的品质？如何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形象，如何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如何确立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身份？这正是笔者在本书中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五四”新文化先驱们提出与“世界文学”沟通，并非要全然破坏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是力图超出传统文学的“家国”范围，弘扬一种超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加入现代性文学之列，在更广阔的全球文化空间里再造中国文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往往是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自娱自乐、展示才学的方式，社会功利性目标不强；“世界文学”则是中国文学界以文学的现代化为核心来进行文学革命，以尚未及时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改造中国文学时所提出的，极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最初将文学作为新民的工具，以此为小说正名，亦为白话新诗扫清障碍。但文学一旦成其为工具，便可以不止为新民的工具，还可以为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工具、商业的工具……与古人“君子不器”的精神背道而驰。

正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参照下，在一个全新的时空秩序中，觉醒的中国人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思想与标准来评价本土的传统文化，西方思潮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变革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批评武器。梁启超倡导文界、诗界、小说界“三界革命”时，便以融汇西式的新词汇、新文体等来革新传统文学。晚清到民国初年，整个社会的转型尚未到达其临界点，思想界亦未出现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学变革，仍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范畴内，总体上仍属传统文学内部的调整与变通。

如果说梁启超这一代学人评价文学的标准仍是以中国传统诗文精神为准则、要求“以旧风格”、“古人之风”入诗方成其为诗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则完全打破了文学与传统风格的联系，极力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彻底决绝的态度否定传统。胡适提出“文学八事”，要求“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大力倡导以“白话文”写作，提出“诗体解放”，要求新诗摆脱旧体诗词的束缚，用白话，不拘格律，不用对仗，心里怎么想

就怎么写^①，译介散文化的西洋诗，借此刺激中国诗体的解放，并首开风气，“尝试”创作白话诗。

直接置身于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之中，“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在酝酿、发动和发展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文学，其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②，实现文学的现代化的途径，就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一员，以此获取民族自我振兴的文化认同力量。

在先驱者看来，实现文学现代化（文学现代性）的方法与资源均来自西方——其眼中的“西方”特指挟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欧美西方现代工业强国。他们大都做过译介西方文学的工作，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瞿秋白、郑振铎、茅盾等，都是活跃的世界文学译介者，都不同程度地取法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与哲学思潮——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意象派、未来派等文学思潮，亦有社会进化论、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掀起了一场“西化”的文化热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和理论来源。鲁迅参照国外近现代小说的体式，广泛吸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手法，写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以其“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③。

“五四”一代先驱者身处时代与社会转型大潮中，议论的话题切近实际问题，加之本身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其文学理论与批评极富生气，又善于运用现代媒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他们的思考大都援引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又急于解决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所提出的迫切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最明显的是得风气之先的文学革命的急先

① 胡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学，完全不同于黄遵宪等人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后者是传统文学内部的调整，基本上仍用文言创作，讲求对仗工整、格律严谨。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有本质区别。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锋——现代新诗，可以说，自其诞生起，便不断受到质疑^①。

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自觉地与“世界文学”挂靠，试图通过汲取西方现代以来文学与哲学思潮，改造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上大胆革新，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新文学，实现文学的世界化。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文学团体之一——“文学研究会”，其宗旨就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②。“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是一对矛盾统一的概念，20世纪30—40年代，还发生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世界文学”与“民族形式”的矛盾再度提出。出于抗战宣传需要和提升民族自信心的考虑，如何利用“民族形式”提上日程。出于宣传工具的考虑，对“民族形式”的选择，则有意避开“五四”新文学资源，因其西化风格不利于大众化的启蒙宣传。“五四”式启蒙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式启蒙，其受众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并未能享用这“替欧化的绅商换口味的鱼翅酒席”^③的文学盛宴。对“民族形式”的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选择了通俗易懂的民间文艺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过几次关于“民族形式”与古代文学资源利用问题的讨论，但都有倾向性地选择了民间或半民间性质的古典文学资源。

历史如此相似，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再度在中国跑马圈地、粉墨登场，“世界文学”与“寻根文学”几乎同时上演。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类似的是，中国文学艺术再度出现了迫切被世界承认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世界文学承认本国文学身份的内在焦虑，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内文学艺术界对文学艺术价值及审美与批评标准的界定。“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而不是“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以致许多文艺界人士“挟洋自重”。先锋派文学的出现不能说与此无关，尤

①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有详细论述。

② 《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转引自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③ 瞿秋白曾抱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商换换口味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了。”（《大众文艺问题》）“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衣衫！”（《文艺新闻社“请脱弃‘五四’的衣衫”》，载苏汶编《自由文学论辩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306、333页。

其是后期的先锋派之末流，徒具其形，在作品中大肆卖弄西化的形式与技巧，等而下之者，则成为西方诸多现代、后现代概念术语的演绎与堆砌。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西化派的建构式努力不同，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锋派所汲取的西方思想资源，更多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因素，呈现在其作品中的是为解构而解构的姿态，为了否定而否定，“躲避崇高”成其旗帜。描写各种禁忌成了先锋艺术挑战传统、走向世界的手段，性、色情、暴力、血腥、杀戮、窥阴癖、拜金主义等，无不在先锋派文艺中得到淋漓尽致、不厌其烦的详细描写，可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此来靠近西方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才是其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目标一致，但动机与效果迥异。

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锋派、前卫艺术家们的艺术与思想水准，是否被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所接纳呢？套用一位西方批评家所说：“在当今的后现代场景里，谈论前卫艺术已无意义。任何一个前卫艺术家都可以采取由具有高度现代性的狂飙突进运动传承而来的态度——但是，在目前状态下，这只不过是故做姿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姿态。使过去失去意义，于是未来将一无所有，对任何事物都不负责任——所有这一切仅仅是装饰而不是反抗，当然更不是精神上的坚忍。‘后现代主义前卫’一词成为自相矛盾的术语。”^①

既然并无真正的精神内核与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打着“先进”概念的文艺作品却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呢？究其根底，源于现代性启蒙思想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时就带有极度悲愤与孱弱的病态心理。西方“启蒙思想所代表的科学、民主、法制、个人尊严等，虽然具有普世价值，但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真理，不能被绝对化。一旦这些伟大的价值被神化，就会变得横行霸道，人的心将被它们奴役，我称这种被奴役的心态为‘启蒙心态’（Enlightenment Mentality）。现代中国知识人多具有这种心态”^②。不少学者称中国已进入了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但实际上中国工

① [英] 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邹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② 杜维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跋》，见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业化进程远远滞后于西方。所谓的“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对中国来说，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化”仍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西方内源先发的现代性（现代化）对中国这样的外源后发型现代性（现代化）来说，至今仍有一定的典范意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使物质生产力水平高低、经济现代性的发展程度成为判定一个国家及其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国人将其思维方式渐渐内化到百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形成了深深的文化自卑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只要与“洋”字沾边，就自觉低人一等。这种现象，在本应是国人更应有发言权的“汉学”领域表现得也很突出。“‘进步论’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先验地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丧失了用自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去评判事物的能力。中国人失去了说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的底气，或是有理说不清。人家的艺术先验就是‘国际’‘先进’水平，你的观念先验就‘落后’，甚至‘前现代’‘农业社会’。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怪诞现象：众多国人对一些国内外‘当代艺术’看不下去接受不了，却又觉得‘理’不在自己一边。欲说还休，没法去说。当你原来用了几千年的‘理’被国人普遍认为‘落后’时，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只能睁眼看着这些‘国际’‘当代’‘艺术’在中国成为朝野时尚”^①，河清的言辞虽然有点偏激，但的确很好地解释了当下发生在中国的打着“全球化”、“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现代化”、“先进”、“进步”、“发展”等口号的艺术行为、行为艺术，甚至整个国家的工农业、商业、城市、农村的建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价值取向。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歌德当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歌德，使他创造出了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②。歌德还认为：“如果某一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毫无兴趣且无贡献，该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将

① 河清：《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现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扉页。

② 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